

李
贛
熊家良
蒋淑娴
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

ZHONGGUO DANGDAI WENXUESHI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Textbook Series for 21st Century

中国当代文学史

李 贛 熊家良 蒋淑娴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2)的发展历程,注意吸收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既从整体性的历史与现实观念出发,又涵盖了整个当代时限;既从各种文学现象入手,又注重创作实践的具体文本的把握;同时也对台湾、香港文学进行了阐述,增加了容量。本书坚持文学史编写的原则和立场,坚持美学分析和历史分析并举,表现了独特的创意。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教材及参考材料,也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史 / 李贻, 熊家良, 蒋淑娟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ISBN 7-03-012644-0

I. 中... II. ①李... ②熊... ③蒋...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0912 号

责任编辑: 陈 露 / 责任校对: 连秉亮
责任印制: 刘 学 / 封面设计: 一 明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 www.sciencep.com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135(720×1000)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2 3/4

印数: 1—6 000

字数: 455 000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引 言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旅程	1
第一章 50年代、60年代的文学思潮	18
第一节 如何书写历史：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
第二节 如何认识“现实”：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21
第三节 如何理解学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24
第四节 非对话性学术辩驳与尚待深入的若干理论问题	26
第二章 50年代、60年代小说	29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小说概述	29
第二节 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	34
第三节 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	43
第四节 “干预生活”的小说	54
第五节 历史题材的小说	59
第三章 50年代、60年代诗歌	63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诗歌概述	63
第二节 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	66
第三节 贺敬之、闻捷的新生活赞歌	70
第四章 50年代、60年代散文	77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散文概述	77
第二节 优秀的文体家杨朔	82
第三节 历史沉思的秦牧	86
第四节 追寻时代的刘白羽	89
第五章 50年代、60年代戏剧	93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戏剧概述	93
第二节 《茶馆》	101
第三节 《关汉卿》	104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	108
第一节 “文革”文学的历程及溯源	108



第二节	“文革”公开文学扫描	111
第三节	“文革”中的地下文学	115
第七章	80年代的文学思潮	117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初期的复苏	117
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探讨与争鸣	122
第三节	创作潮流的多元化格局	125
第八章	80年代小说(一)	128
第一节	伤痕小说	128
第二节	反思小说	132
第三节	改革小说	147
第四节	寻根小说	158
第九章	80年代小说(二)	176
第一节	知青小说	176
第二节	军旅小说	180
第三节	历史小说	184
第四节	风情小说	188
第五节	先锋小说	201
第十章	80年代诗歌	217
第一节	“新政治抒情”：时代潮头与历史备忘	217
第二节	“朦胧诗”：“中间物”的美学原则	223
第三节	“后朦胧”时代：“原始杂陈”和海子的意义	231
第十一章	80年代散文、报告文学	241
第一节	80年代散文、报告文学概述	241
第二节	80年代散文	243
第三节	80年代报告文学	253
第十二章	90年代文学思潮	263
第一节	新写实主义思潮的发展	263
第二节	90年代小说与“人文精神”	264
第三节	新表现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	266
第四节	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延续	267
第十三章	90年代小说	269
第一节	90年代小说概述	269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	273
第三节	女性小说	278



第四节 新生代小说	282
第五节 网络小说	286
第十四章 90年代散文、报告文学	291
第一节 90年代散文、报告文学概述	291
第二节 90年代散文	292
第三节 90年代报告文学	299
第十五章 90年代诗歌、影视及戏剧	306
第一节 90年代诗歌	306
第二节 90年代影视、戏剧	312
第十六章 台湾文学	321
第一节 台湾文学概述	321
第二节 乡土小说	324
第三节 现代派小说	327
第四节 乡土回归小说	335
第五节 “三毛”热潮	339
第十七章 香港文学	344
第一节 香港文学概况	344
第二节 通俗小说	346
第三节 都市写实小说	350
第四节 财经小说	354
后记	357

引 言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旅程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①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阶段性划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其成就是以往任何阶段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下半叶却形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分流的局面。但是,文学有根,同宗同祖,同一母语,共同的文化“寻根”使命,使祖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作家们在追求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内涵上,呈现出许多共性与特征,从而为两地文学最终走向交流、整合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契机。在我们进入了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对当代文学应当有更为全面与深入的观察和把握。

一、20世纪中国文化话语中的当代文学

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崭新的世纪。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勃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此后,在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各自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从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从经济体制到民族风俗,都有极严格的区别,并且长期处于一种敌对状态和斗争之中。这种新的世界历史格局的形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使20世纪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跳出了古典诗文革新的窠臼,挣脱了近代文学改良主义的束缚,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最后转变,即成为20世纪初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指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另一方面,则使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始终置身于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格局之中,并在它的影响和制约之下参与到改造中国和改变自身的历史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因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而获得了新的文化品格和本质规定,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态和精神传统。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上,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文化派别的分裂与斗争,和各种不同的文学潮流的消长与更迭,但就其贯穿始终的主导倾向和主要潮流而言,都是在这种新的世界历史格局中,伴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文学。

学术界习惯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现代文学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而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祖国大陆文学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正是从文学作为一种新社会意识形态的属性方面,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按照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所作的阶段性划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① 故此,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都是整体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即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同发展阶段。正如中国革命的这“两个步骤”具有一种先后承接和转换递进的关系一样,当代文学无疑也是此前阶段的中国文学主流的一种历史的发展和延续。

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主流的这种整体性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在发轫之初,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本来就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种自觉的提倡。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文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有力的一翼。这个文学运动经过 10 年的艰难发展,逐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的革命传统。40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的新人民文艺,是中国革命文学传统的发展和延续。尤其是 1942 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系统地总结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尤其是作为主流的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见解和思想,为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主流的革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成了当代文学的理论纲领和指导方针,在《讲话》的指导和影响下,40 年代解放区贯彻“工农兵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 666 页



方向”的文艺创作和国统区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的奠基工作。尤其是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期间创作的大批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当代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更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①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7年的文学,时起时伏,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此期间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局限性。

首先,它适应了文学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现实生活的需要。广大工农兵在新中国翻身当家作主,焕发出高度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描写他们的新生活,歌颂其豪迈的英雄精神是时代对文学的迫切需求。适应这种要求,解放区的文学经验和理论得以深入贯彻和大力推广。工农兵是新生活的主人翁,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的主人翁。对工农兵如此热情关注,对其革命精神如此集中地颂扬,这是其他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无可比拟的。解放区文学的种子在新中国遍地开花结果。特别是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生动表现。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及浩然的《艳阳天》等,都是反映这一时期现实生活的脍炙人口的佳作。

其次,它适应了文学表现革命历史斗争的需要。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创造了辉煌业绩。解放区文学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只是在战争纷飞的年代还来不及充分予以描写。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有机会发扬革命文学的传统,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历史生活熔铸到创作之中。这批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鲜明的英雄形象、突出的斗争主题,而且颇有艺术感染力。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冯德英的《苦菜花》以及王愿坚的短篇小说是有代表性的作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等集中描写革命战争的小说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再次,它还对作家队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正确地认识生活与创作的源流关系,推动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去”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要求。尤其是抗美援朝以及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都吸引了大批作家。巴金、魏巍、路翎、杨朔、陆柱国等作家奔赴朝鲜前线,创作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谁是最可爱的人》、《洼地上的“战役”》、《三千里江山》、《上甘岭》等优秀作品。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陈残云

^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包括戏剧、小说、通讯报告、诗歌和说书词等,共计53种,全部是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48年版)、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8年版)于1952年分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三等奖,同获二等奖的还有歌剧《白毛女》。又如创作于1948年的话剧《红旗歌》、《战斗里成长》等,在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此外,还应当包括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构思酝酿或先期创作,在当代文学中才最后完成或改写定型的作品在内。



的《香飘四季》等都是这些作家长期扎根农村的收获。其二，鼓励作家在民族大众化的道路上进行艺术探索。赵树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追求让农民喜闻乐见的小说写法，新中国成立后在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写“中间人物”方面创造了民族化的新鲜经验。老舍创作了《龙须沟》、《茶馆》等京味话剧。郭小川和贺敬之等诗人在将古典的、民族的和外国的诗歌写法融入新诗歌形式的实验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杨朔与秦牧、吴伯箫、刘白羽、碧野等各自以其独特的散文风格称誉文坛。田汉、郭沫若则在历史剧《关汉卿》、《蔡文姬》的创作中所进行的戏剧的尝试，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50年代后期“左”的思潮抬头，60年代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导致后来“文革”悲剧的发生。这个历史教训在文学领域也严重存在。首先，在理论上搞乱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和政治同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尽管政治总是处于中心的地位，但仍然不应忽视文学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及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未能坚持科学的、清醒的认识，一度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片面性口号，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利用，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纲领，实行封建法西斯专制。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造成的混乱，使党的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受到影响，导致了政策的严重失误。其次，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审美的、教育的、认识的和愉悦的多种功能，在通常情况下，审美的功能是其首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功能，其他的功能往往通过它才能得以实现。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原苏联文学中形而上学理论的影响，我们在文学功能的问题上产生过糊涂认识。比如，在学习和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过程中，在贯彻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的同时，也产生了狭隘功利主义的倾向。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曾以偏概全地将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的概括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将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归结为“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周扬在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就曾经直截了当地为狭隘功利主义做了注脚：“创造先进人物的典型去培养人民的高尚品质，应该成为我们的电影创作以及一切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最中心的任务”。^①“四人帮”在“文革”中提出了“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等一套形而上学的谬论，无法准确而全面地理解文学的特性和内在规律，成为产生公式化概念化弊端的主要根源，

^①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



另外,还严重束缚了广大作家的艺术创造精神。虽然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就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其后的第二次文代会、贯彻“双百”方针、60年代初的文艺政策调整等重要历史时刻,都再三重申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政策。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影响,政策的执行常常受到冲击。例如,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对作家队伍的打击面不断扩大,造成的伤害越来越严重。再如政策的狭隘功利主义要求作家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并且到工人农民中接受改造,严重挫伤了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理论的混乱和政策的失误,也造成了文学观念的僵化和艺术思维的封闭,压抑了在精神上独立创造、在艺术上自由探索的创新意识。

十年“文革”灾难深重,却也为历史反思提供了契机。在文学领域,“四人帮”的罪恶阴谋是造成“文革”悲剧的直接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也就是说,这场悲剧的发生绝非偶然,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期以来,文学理论体系和文学观念越来越深地陷入形而上学,既脱离现实社会的心理基础,又偏离历史文化的发展方向。虽然文艺政策的调整曾在很大程度上有所补救,但仍然未能扼制“左”的思潮的恶性发作。与此同时,灾难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在历史反思中,文学的大变革成为必然。1976年春天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曙光。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文学观念到创作实践发生巨变的20年。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看做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大陆文学发生全面变革的阶段。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的发表是新时期文学发端的标志,1979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举行的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初文学的大检阅。其后的80年代文学,有人用“两个回归”来表述其变革,基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首先,是“文学的回归”。在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界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其实,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并不在急于找到答案,而在于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正是文学观念变革的过程。观念的变革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其一,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层面。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引发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为这场讨论做出科学总结的是邓小平。他在1980年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



治的。”^①在他的主持下，决定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文艺方针，而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其二，文学功能的层面。一方面明确了文学具备多项功能，各种功能之间有着互为依存而且互动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由文学的特性所决定，审美功能在文学这一系统中居于中心和首要的位置，否定那种片面强调教育功能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还文学以本来面目。其三，创作方法的层面。作为对“文革”期间暴露的“瞒和骗”文学的反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一方面及时总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实现现实主义突破的经验；另一方面对50年代以来围绕现实主义问题反复进行的文艺思想斗争重新加以认识，深入反思，不仅提出“从生活出发”的质朴口号以推动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化和开拓，而且以“真实性”为出发点系统地阐明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文学史意义。在创作方法问题上观念的变革更进一步地体现于对长期以来现实主义一家独尊的文学史现象的质疑。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的成功探索和实验，为这一领域的观念变革提供了现实依据。

再是“人的回归”。这一问题的提出有特定的文化背景。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拨乱反正”，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在于“人的解放”的问题。思想界将这种关注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反思联系起来。1979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研讨会集中体现了这种文化态势。顺应这一态势，文学界则直接地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联系起来，而且集中于“人的主题”。对于处在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正在大力张扬反思和批判意识的文学界来说，这样的文化思考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潮，尤其“文革”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是禁锢“个性解放”，否定人性价值的。于是，像“五四”文学那样，倡导“人的主题”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鲜明特征。这种特征既体现于文学创作上，也体现在文学批评和理论实践中。《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其振聋发聩之处就在于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呐喊。这与鲁迅当年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绝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回应。大潮般涌来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和对历史的反思集中体现于对践踏美好人性的揭露，在历史教训的追溯中全方位地展示人性，在悲剧性的命运中逼视情感和心灵世界，真实地刻画生存状态，满怀忧国忧民之情来思考人的价值失落的教训。无论“改革文学”、“军旅文学”，还是“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文坛思潮迭起，可是关于“人性价值”、“人的解放”的审美思考却始终处于种种思潮的核心部位。80年代的文学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学是由“人的主题”贯穿着的。

^①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255页



学术研究界对于一次次创作的潮涌都予以热切关注,深入思考“人的回归”这一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特征所体现的文学史意义。这种思考既有“五四”以来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又有对50年代以来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其后在反右派运动及60年代直至“文革”对钱谷融、巴人的批判,可以说“文学是人学”以及人性、人道主义的有关观点和理论主张在接连不断的批判运动中总是在劫难逃。这些富有真理性的观点和理论的屡遭封杀,致使文学“谈‘人’色变”,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学批评和理论界对于新时期文学创作“人的主题”的表现的全面肯定,阐扬了文学的特性,并使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在文学史上的主体地位得以恢复。对此,学术界表现了善于理性思辨力求创造系统性理论架构的科学精神。例如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构想,在学术上就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80年代的改革开放推动社会快速变革,积聚蕴蓄着发展的张力。同时也产生了文化的浮躁,甚至酿成80年代末的一场政治风波。但是,改革发展并未因此而转向,社会发展的力度更未因此而削减。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在90年代更加向纵深发展。社会文化形态集中呈现转型特征。

20世纪90年代大陆文学的转型有着时代文化的依据。从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到市场经济的出现并迅速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经济制度的转型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极大冲击。原本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单一文化迅即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商品文化凭借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手段急速发展,并向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辐射和渗透。社会文化的结构形态由此而骤生激变,不仅更具开放性、动态性和多元性,而且由单层面的线性形态转型为网络化的系统运动形态。90年代文学史也由对意识形态的集中关注而向社会文化的多元构成全方位展开,并因商品文化的推动而汇入大众文化的汪洋大海。

90年代大陆文学的转型又是以文化的全球化为背景的。早已出现的文化全球化趋势,在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而愈加强化。90年代文学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文化语境。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已经萌发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意识,例如这种意识曾是“寻根文学”产生的文化动机。不过,80年代文学的这种对话意识是把自身和世界文学当做此岸和彼岸来看待的,而在90年代则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文化意识的超越,既要求将本民族的文学融入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之中,又要执著于民族文化的建构而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让中华民族的文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90年代大陆文学的转型明显地表现为商品化属性的剧增。从创作到出版发行过程中的艺术化的神圣光环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的生产和商业化的销售过程。商品化成为文学与社会受体之间联系的基本途径。文学创作不再



是自足的过程而是变得难以摆脱商品化的包装。市场经济在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大众文化的浪潮,将纯文学的光彩冲刷得面目全非。大众文化的市场主体特征、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信息化的传媒以及世俗化的快乐原则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文学挺进和渗透。文学调整着创作方式和审美态度,以适应大众化的规范。同时,文学又顺应大众文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美学理想与艺术原则的实现中进行整合。一批批中青年作家以崭新的姿态在大众文化条件下创造了令人惊异的文学生机。多元化是90年代大陆文学转型的另一个表现。80年代文学的基本着眼点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社会批判和历史反思。对于90年代大陆文学,有人曾用“边缘化”^①来指称。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确有不少作家在社会转型中选择了与意识形态中心相对性的边缘视角,也有作家以“个人化”和“私人化”^②的写作态度来适应大众化的需求。可是,这种说法又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够确切的。因为“边缘化”不可能从整体上涵盖90年代大陆文学,甚至也算不上90年代大陆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向。在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文学是以多种形态存在并由多角度辐射而多向发展的。其中,优秀作家不乏其人,他们创造着文学的新风尚,又执著于历史文化内涵的熔铸。更有不少作家热切地关注社会转型中的生活现实,关怀着老百姓的生存和愿望,坚持以文学审美手段表达忧国忧民情怀。90年代的多元化文学,既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又体现着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方向。

二、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文学

当代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港、澳文学,都发展于“全球化”由缓慢至迅速兴起的历史时期,但大陆与台、港、澳地区对“全球化”的迎拒关系是完全不同的,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格局有别于其他国家文学的特殊关系。

尽管台、港、澳地区与祖国大陆处于隔绝状态,但社会的分割并不意味着这些空间区域的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分化。作为民族文化边缘的台、港、澳地区,在20世纪的上半叶,几乎与作为民族文学中心的大陆文学走了相同的发展道路,构成了相同的文学形态。无论是20年代台湾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呼应,还是抗战时期香港文学对于大陆文学潮流的接纳与延伸,或者是澳门在抗战后出现的新文学,在文学的主流上,台、港、澳文学都没有脱离中国文学母体而走上异质分流的道路。大陆、台湾、港、澳三个空间不同文学进程与各具形态文学的形成,是开始于50年代,形

① 吴义勤.《在边缘处叙事——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论》.《钟山》.1998年第1期

②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1月



成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流程中。

说起 50 年代大陆、台、港、澳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社会制度、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所带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分化。这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但仅从制度、阶级和意识形态上去对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分化，我们就很难对当代文学这三个空间的格局作出整体性的和逻辑性的把握，相反会出现以前那种把台、港、澳文学排除在中国当代文学之外或当下还是对大陆、台、港、澳文学作分割式研究的状况。从文学的外部力量看，是三个不同空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和形态，与经济全球化在这三个空间的不同表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在 50 年代重新起步，尽管 60 年代西方的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已经给经济全球化奠定了迅速推进的基础，但直到 70 年代其步伐还是缓慢的。这个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原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确立，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也阻止了资本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世界也因此形成了不同意识形态结盟的两大阵营。

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大陆，是在一种自足的经济体系与自足的文化思想体系中产生的，它走的是从抗战时期开始实践的原苏联文学道路，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为建设方针，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阶级英雄的浪漫形象、豪迈的叙事基调和不可偏离大陆政治生活的文学方向，从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加入世界的冷战，遏止了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尽管此间大陆文学发生了许多的事件和思想论争，但文学的形态和性质是没有什么变动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原苏联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

但台湾文学的进程与形态则在此间有了重要变动。1950 年是台湾文学的一个转折点，台湾文学由此开始了长达 30 年之久的与大陆文学的分道扬镳。50 年代台湾经济就接纳着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各种支持，从经济上的依赖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与祖国大陆不同，从 50 年代开始，台湾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被纳入了西方世界，这就造成了台湾多重深刻的文化矛盾，其一是依赖于西方世界与作为西方经济的附庸的矛盾；其二是作为殖民地社会的地位与具有悠久辉煌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冲突；其三是脱离文化母体的漂泊与踏上世界性、全球化经济的历程的冲撞，在这种与大陆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台湾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其过程是作为阶级对抗的“反共文学”很快就失去生命，50 年代深受西方世界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推出，形成文艺思潮，席卷 60 年代的台湾文坛，其作品流露出来的失落感和逃避主义正是台湾接触全球经济时生存怅惘的表征。70 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以加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一方面带来台湾经济的起飞，一方面则产生知识分子对殖民社会附庸地位与



被剥削的思考,于是乡土文学带着“将台湾联系到‘世界其他弱小民族’的国际位置”和“跳脱至世界史的角度”的文化反省意识,在台湾文坛崛起,爆发了70年代初与70年代末两次乡土派与现代派的决战性论争,并且以乡土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取代了台湾现代派文坛主流的位置。这两场论争已经极鲜明地体现了全球化经济中的各民族文学确认自身文化个性的特征。

香港文学在50年代也脱离了民族文学中心的大陆文学的运行轨迹。与台湾文学相似,由于右翼文人从大陆涌入香港,曾有一段时间香港文学呈现右转趋势,到5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香港兴起,成为60年代香港文学的景观。但与台湾不同,香港在政治上是完全的殖民地性质,在经济上是跨国资本在东方运作的一块聚焦地。尤其是冷战时期,由于东南亚周边国家社会主义联盟势力的强大,西方世界几乎是将香港作为东方经济延伸的惟一通道,所以,香港文学在全球化经济缓慢进程中,很快出现了对于民族文化体系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肯定,香港文学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就是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分离的矛盾和痛苦。澳门文学是个特例,但在内在本质上,与香港文学有相通之处。

这时期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澳门,由于工业化带来了这些区域文化工业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通俗文学的勃兴是这些区域文化的一种奇观,尤其是台湾、香港的言情、武侠小说。通俗文化的迅速发展,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化与文学的身份和功能。

由此可见,在50年代至70年代这段“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是: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它以自足的姿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御着“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威胁,也为“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学个性的确认奠定了基础;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其文学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变动的特点,它们在那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

世纪之交,走向一体化。20世纪的最后20年,东西方冷战结束,伴随着科技、资讯的高度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趋势,“全球化”的步伐快速推进。此时,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都市化的步子加快;台湾则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形成了都市社会,体现出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状态;香港和澳门的都市社会更呈现出全球都市的特点。这一时期大陆、台、港、澳的文学语境,基本是一样的。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大陆或者台、港、澳,都展现了诸多全球性的相同特征。其一是文学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其二是都市文学的繁荣和表现领域的扩展;其三是个人化写作倾向的加重;其四是仅仅依恃于都市经验而写作的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形成,他们以“另类”的写作方式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其五是作为生产



快乐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它甚至改变了文学的身份,消弥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文学被包装、被炒作,借助于机构而生产的趋势越来越严重。这些带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学现象,似乎正在证明亨廷顿的那句话: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与此同时,大陆、台、港、澳共同重建世界文学的汉语文学中心的趋势也露出端倪。在80年代初,世界文学与台、港、澳文学进入大陆,影响了大陆文学,发起了一次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这阶段,台、港、澳作为世界当代文学进入大陆的中介作用是相当明显的。而后,大陆作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世界化,逐步返回到中华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在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作家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下,发动了一次“文化寻根”热潮,立即得到了台港文学界的热烈呼应。仅从台湾文化界对寻根文学的推崇和出版界对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对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有组织地翻译和向西方世界推介的热烈,就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三个空间在影响方向与秩序上的重新置换。到这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趋势,就不再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以民族文学的内部为一方与全球外部为另一方的冲突。

事实上,经济、科技、信息的全球化,一方面导致了国家政治意识的弱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的归宿感的危机。在此情势下,根据文化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个性,便成为各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至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全球化”也应是经济一体与文化多极选择和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当然,这并不排除民族文化在相当的程度上采取并吸纳诸多全球文明的因素。这样,有着5000年辉煌“文化中国”的重新崛起便是符合历史的一种必然。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而使其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的基本价值判断标准,就是人、社会、文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主要指人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也就是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树立;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指现代公民社会即民主社会的建立,实现一系列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相联系的社会制约;文学的现代化则是指脱离“文以载道”的“工具论”的束缚,实现文学的自觉,创造出与人性与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所有这些,也都是出自西方中世纪之后人文精神在几百年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价值体系。胡风说:“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